



西北地域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西北论坛论文集

主 编 高人雄

副主编 多洛肯 黄大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地域文学研究

——中国文学西北论坛论文集

主 编 高人雄

副主编 多洛肯 黄大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地域文学研究：中国文学西北论坛论文集 / 高人雄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9

ISBN 978 - 7 - 5161 - 4658 - 3

I. ①西… II. ①高…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西北地区—文集
IV. ①I209. 9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8609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田 文
特约编辑 赵楠芳
责任校对 李 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468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高人雄

近年古典文学开拓研究领域，掀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古代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的热潮。西北地域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互动发展，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论集以中国古代西北地域文学及文化为研究主题，探讨中国文学史上以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为中心的西北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河西边塞文学的民族地域特色、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途径等目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阐释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与西北地域文化、西北民族文化的关系。论集内容丰富，有综合考察，也有个案研究。

一是侧重展现西北民族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创作中的诸多西北多民族文化因子。古代西北地区民族繁多，在历史文化的长河中，相互融合与交流是必然现象。文学植根于文化的土壤中，西北多民族文化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本土文学的发展。从北周宇文鲜卑、关陇氐羌等少数民族文学及民俗文化入手，可克服以往对北周文学研究多限于由南入北的文人及个别北地汉族文人的片面性，客观阐释北周关陇地域多民族人文精神的文学状况。高人雄《北周关陇地域民族文化的沿革》即从氐族的地理文化沿革、羌族的地理文化沿革、稽胡的地理文化沿革、鲜卑族的地理文化沿革、汉族的地理文化沿革等方面说明了关陇地域民族文化状况，进而说明关陇文化必然深刻影响和制约北周本土文学的发展。再如范子焯《浩林·潮尔与胡笳：中古时代的喉音艺术——以繁钦〈与魏文帝笈〉所反映的西北民族音乐为中心》从浩林·潮尔的发声原理以及胡笳的形制、繁钦《与魏文帝笈》的历史文化背景、从繁钦《与魏文帝笈》看胡笳与

中古时代礼乐和军乐的关系、从繁钦《与魏文帝笺》看呼麦的发声技巧等方面阐释了《与魏文帝笺》对研究中亚的潮尔艺术史、考察阿尔泰音乐形态乃至探讨中国音乐史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文章图文并茂、引证确凿、联想丰富，学术性与趣味性兼得。再如王锺陵《飞天形象的演变及当代诗人对其的描写》描述了敦煌艺术中有代表性的飞天形象的演变，以及当代诗人对其的哲思。文章视角新颖，见解深刻，富有才情诗意。再如李永平、王天觉《李贺诗歌与唐代外来文明》阐述了李贺诗歌中的唐代甚或以前的外来风物，成为研究外来文明的史料。文章以唐代的外来文明特别是唐代的舶来品为视角深入全面地审视李贺诗歌的独特美，并分析了这些物品在李贺诗集中大量出现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李贺处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而产生了猎奇和追忆盛世繁华的心态；二是李贺苦闷的心理造就了他对宇宙人生等形而上学问题的思索；三是李贺在与同时代其他诗人如韩愈、孟郊的交往中形成并深化了他猎奇的心态，导致了他对外来事物的大量记载。鞭辟入里，实为高论。再如郝青云《和瑛〈西藏赋〉的民族文化交流功能》以全景的方式展现了西藏这幅美丽而独特的画卷。作品对西藏的自然地理、社会历史、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入细致而全面地描写，同时又在西藏与内地之间架起了历史与文化的多架桥梁，非常突出地展现了作品的文化交流功能。再如高建新《唐诗中的北部边防重镇——“金河”》展示了金河在唐诗中的书写。指出金河即今天呼和浩特市南的大黑河。金河在《全唐诗》中一共出现了20余次，大多数与边塞、战争、烽烟、荒凉、僻远以及边塞建功的理想、思乡盼归的感情相联系。唐代金河诗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未出现高、岑那样的名家，却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唐代北部军事、边防、地理、风俗、风光等方面的珍贵材料。文章体现了撰写者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扎实的地理文化知识和文学素养。

二是西北多民族文化及其文学的个案、专题的研究。文学植根于文化，不同的文化土壤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文学形式以及文学成就。论文展示了西北不同地区作家的人生轨迹，如朱则杰《清代甘肃诗人丛考——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为中心》对《提要》中的甘肃籍作家张晋、邢澍、马疏、牛树梅、张和、王权、朱克敬、王源瀚、孙海、安维峻、王树中、任承允、巨国桂、李于锺、张建、程天锡的生平事迹给予了补充、订正，引证丰富，学术价值较高。再如陈君《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

环——关陇高士及其对隐逸传统的建构》特别关注东汉至魏晋这一历史进程中关陇地区的隐逸士人，他们对中古隐逸传统的形成发挥了关键作用，而此正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文章从地域角度来观察中古时期的隐逸传统，不难发现，东晋以前，北方高士是隐逸传统的主流，关陇高士可视为他们的代表。汉代的关陇高士与以陶渊明为代表的南方高士，一北一南，各具特点，都是中古文化史上最美的风景。他们一起为中国的士大夫传统注入了思想的清流，让后人从中汲取道德的力量。再如龙建国《“陇头”文学元素解析》介绍了传统乐曲“陇头”这样一个古老而常青的乐府诗题，它已成为独特的文学题材、意象元素，为诗歌创作拓宽了空间，提供了新的领域，展示了一个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文化现象以及它的流播，俨然已成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再如延娟芹《石鼓文与游猎文学的发展》指出石鼓文是从《诗经·车攻》到汉大赋之间很重要的一环，在二者之间起到了桥梁的作用，其出现与秦国文化有直接关系，以及石鼓文对后代文学有重要的影响。再如王树林《元西域散文家及其散文成就》从三个方面对西域文家展开论述：西域散文家的群体构成及社会文化共生环境；西域散文家散文的文献考察；西域文家散文的整体风貌及民族特质。最后说明了少数民族质直、淳朴的民族特性不仅影响了西域散文家人格气质的形成和定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域散文家的散文创作，造就了其散文独有的民族特质。论据充分，结论有力。再如刘嘉伟《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动对元代“清和”诗风的影响——以西域诗人迺贤为叙述中心》以西域葛逻禄诗人迺贤为叙述中心，考察了元大都多族士人圈文化互动的情况，探讨其对于元代清和诗风的影响：在频繁的文化互动之中，少数民族诗人的尚清诗风被文坛广泛接受认同；汉儒的浸染陶冶，也使得民族诗人涵醇茹和、笔触工润。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促成了诗风的新变，这可以说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再如钟进文《作为“方法”的西部文学》强调西部文学中的“西部”特征：地域的多样性、民族的多元性、宗教的交融性、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混杂性，以及西部文学内部研究的可能性：民族文学的区域共性特征、区域与民族互文性彰显西部文学的特征。对研究西北文学具有一定的建设性意义。

三是论文研究视野开阔，体现通达的历史文化观念。中华民族地大物博，不同地区之间相互融合的趋势弥久不衰，其关系可以说是盘根错节，同时，不同区域具有鲜明的历史文化特点。专家一方面积极探讨西北地区

多民族文学的同时，对其他区域文学也有着独到的见解。如薛瑞兆《论女真字文化的兴衰》详尽阐述了女真文字的创立、女真文字的应用、女真文字的衰落等，并指出女真文字的兴衰是同女真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历史表明，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字只有承载自身足够的文化经验，才能比较充分地吸纳其他民族的文化营养，形成并保持自己的传统。否则，就会丧失竞争力，在民族政权覆灭或是在融入先进文明的过程中而渐次消亡。文章见解深刻，材料新颖，具有较高的文学、文献价值。再如王昊《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在充分理解已有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扬弃“盲点”另觅蹊径，采取“复合和逆向思路”，从看似对立歧异处突破，对《刘知远诸宫调》的作期和著作权问题予以综考，并指出《刘知远诸宫调》辽金西夏三地传播个案的文学史意义，即刘知远由草民到皇帝的传奇，不但契合着彼时广泛地域中的市民“变泰发迹”心理，而且在文学史的意义，作为讲唱文学的诸宫调正可视为叙事诗传统晚生和不发达的中国古代汉语言文学中的“英雄史诗”。文章构思独特，方法独到，结论合理。再如裴兴荣《论〈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史意义》指出《中州集》记载金代史料丰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诸如金人论述本朝文学的“国朝文派”是今人研究金代文学史分期的重要参照系，“吴蔡体”则给金词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和论题；有关金代文坛上父兄渊源、师友讲习等文人的交游活动则有助于我们厘清金人诗文创作的源流关系，进而深入了解金代文学繁荣的原因；而其中记载的许多异闻轶事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代文坛尚奇的倾向。文章从新视角对元好问《中州集》重新进行了审视。再如李献芳《杜仁杰在山东的文化活动及其贡献》侧重研究金末元初山东文坛的领袖杜仁杰的诗、文、曲的创作实绩，对文坛由雅到俗的新风的贡献，以及他在严实幕府为诸子师并为其出谋献策，使元初的严实幕府崇尚仁政，兴学养士，修复泰山、曲阜文物，尽最大努力保护和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文章体现了特殊时期特殊地域的文人对当时社会的特殊贡献。

四是论文亦展示了不同地域、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的相互影响。如海外学者赵雪莹女士《满族文学之瑰宝——子弟书》将子弟书置于18世纪北京的文化背景中，并介绍它在19世纪及民国初年于中国北方地区的发展。文章阐述了三种不同语言形式的子弟书，并具体分析一篇子弟书《查关》，以此为例来说明子弟书作者如何诠释改编传统中国戏曲故事。

并指出子弟书虽然由八旗子弟所创，但它的读者及听众不限于满人，为了全面了解子弟书，文章侧重作品中的满文化内涵，又关注汉文化对其的影响。体现了研究者对满族独特文体《子弟书》的深刻认识。再如于润琦《小议满族作家对北京话的贡献》介绍了语言学家对北京话的经典解读、北京话与北方少数民族语言多次交融的深厚历史语境、满族小说家曹雪芹、文康、老舍等对“京师人语”的特殊贡献，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多少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作出过自己民族的贡献。在我们炫耀中华文化之时，切不可只言汉族文化的辉煌，而忘记少数民族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正如邓乔彬《新疆风光和壁画对唐人边塞诗与变文的影响》中指出，颇得之于地理上的西部因素对盛唐诗歌的雄壮、浑厚气象的影响，岑参的边塞诗即是见证。朱易安《唐代诗化的音乐和西部乐器》一文认为，乐器的发展、外来民族音乐的渗透以及唐人对音乐的特殊爱好，对唐代的乐诗和声诗的繁盛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的文章别出心裁，对唐代诗人杜甫精神境界及其创作又有了新认识，如徐希平、彭超《杜甫和陆平等民族观之具体表现——杜甫与少数民族关系之二》指出作为富有儒家博爱精神和宽广胸怀的伟大诗人，杜甫具有和睦平等的民族意识和观念，并分析了其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即广泛结交各族朋友，平等相待；广泛了解和接触多民族文化习俗，反映出博大宽广的胸怀；对斑斓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艺术营养的由衷喜爱，兼收并蓄，吸收运用。对进一步丰富杜甫诗歌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意义。再如张崇琛《中西交通视野下的〈聊斋〉狐狸精形象——从〈聊斋〉中狐狸精的“籍贯”说起》根据《聊斋》中的狐狸精在自报家门时往往称其“籍贯”为陕西，《聊斋》篇中的“女狐狸”大都是好的，而“男狐狸”则多是坏的，深入探讨了中西交通的文化背景对《聊斋》狐狸精形象形成的影响，并启示人们对《聊斋》成书的大文化背景作更广阔、更深入的思考。显示了张先生研究视野的博大与宏通。

五是论文亦体现了对一代文学新的认识与评价，如查洪德《元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与期待》在21世纪新的学术背景下审视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指出了所存在的问题：一是残缺，二是割裂。沿自古代“一代之文学”的民族观念，以及阶级性、人民性的评价标准，不同程度地遮蔽了人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三大遮蔽造成了元代文学史的残缺；一代文学整体意识的缺位，造成了元代各部分文学的相互割裂。文章热切期

待今后的元代文学史研究，应该以多民族共有文化精神统摄各部分或各版块的研究，写出既是全面的又是多元一体的元代文学史。元代作为少数民族政权，处在这个政权下的文人的创作及其思想心态就具有鲜明的特色。任红敏《金莲川藩府文人仕与隐的冲突》阐释了金末元初时期，忽必烈金莲川藩府文人，作为一特殊的文人阶层和群体，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行为方式和心理特征，其中，出仕与归隐一直是金莲川藩府文人的心结，成为元代文人士大夫隐逸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关于传统的古典文学的研究，论文也都见解深刻，创新意识浓厚。如莫砺锋《苏轼与人生》从性情的道德观、重视实践的认识论、愉快的生活态度、平易近人的智者、苏轼的精神家园五个方面阐释了苏轼独特的人生观。文章学术含量高，可读性强，体现了古典文学研究中的深厚的人文关怀。吉定《试论庾信文学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指出在南北朝后期，庾信实现了从“吟咏性情”到“含吐性灵”的文学思想新跨越，在六朝文论发展史上，他的性灵文学观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周茜《李清照是第一流词人吗？——由词学史引发的一段思考》对李词在不同时期的历史地位问题给予了深刻的认识与思考。孙宏哲《明清长篇世情小说女性丑怪身体的群像》主要运用女性主义批评，结合身体诗学、心理分析、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以历史理性眼光审视明清长篇世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通过对女性形象生理层次、心理层次、文化层次的层级式解剖，揭示在封建宗法父权家庭中，在各种宗法礼教和道德禁忌上，女性压抑、内囿的处境以及共同具备绝望、焦虑、病态的特质，构成了丑怪身体群像。李洲良《兴的三重内涵表现形式及其演变》指出兴的内涵及其演变历程依次可分为祭祀之兴、政教之兴和诗学之兴三个阶段。兴在由宗教内容演化为政教内容并最后积淀为诗学艺术范畴的过程中，其表现形式在不同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详尽、深刻地阐释了兴的内涵的演化过程。曹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指出文学传播学还处于创建阶段的背景下，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文章呈现了新颖独特的研究方法与思想观念，有助于推广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论集围绕西北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等问题，对一代文学史进行再认识与再评价，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展现了中国多民族文学与古典文学研究的积极活跃、不断深入、不断提高的面貌。

目 录

在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文学西北论坛”

- 上的主题发言 刘扬忠(1)
-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 曹 萌(3)
- 元代文学史研究的现状与期待 查洪德(20)
- 中古隐逸传统中被忽略的一环
- 关陇高士及其对隐逸传统的建构 陈 君(36)
- 浩林·潮尔与胡笳:中古时代的喉音艺术
- 以繁钦《与魏文帝笺》所反映的西北民族音乐
 为中心 范子焯(50)
- 唐诗中的北部边防重镇
- “金河” 高建新(84)
- 北周关陇地域民族文化的沿革 高人雄(96)
- 和瑛《西藏赋》的民族文化交流功能 郝青云(110)
- 试论庾信文学思想中的核心价值观 吉 定(121)
- 杜仁杰在山东的文化活动及其贡献 李献芳(138)
- 李贺诗歌与唐代外来文明 李永平 王天觉(145)
- 兴的三重内涵表现形式及其演变 李洲良(161)
- 元大都多族士人圈的互动对元代“清和”诗风的影响
- 以西域诗人迺贤为叙述中心 刘嘉伟(179)
- “陇头”文学元素解析 龙建国(194)
- 苏轼与人生 莫砺锋(204)
- 论《中州集》作家小传的文学史意义 裴兴荣(231)
- 金莲川藩府文人仕与隐的冲突 任红敏(246)

明清长篇世情小说女性丑怪身体的群像	孙宏哲(261)
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和著作权综考	王 昊(271)
黑水城出土《刘知远诸宫调》作期研究综述 (1932—2004)	王 昊(284)
元西域散文家及其散文成就	王树林(293)
飞天形象的演变及当代诗人对其的描写	王锺陵(308)
杜甫和陆平等民族观之具体表现 ——杜甫与少数民族关系之二	徐希平 彭 超(312)
论女真字文化的兴衰	薛瑞兆(329)
石鼓文与游猎文学的发展	延娟芹(345)
小议满族作家对北京话的贡献	于润琦(354)
中西交通视野下的《聊斋》狐狸精形象 ——从《聊斋》中狐狸精的“籍贯”说起	张崇琛(366)
满族文学之瑰宝——子弟书	赵雪莹(377)
李清照是第一流词人吗? ——由词学史引发的一段思考	周 茜(391)
清代甘肃诗人丛考 ——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为中心	朱则杰(410)
后 记	(429)

在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主办的“中国文学 西北论坛”上的主题发言

刘扬忠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北地区和其他地区古典文学研究界的各位同行、各位专家，女士们，先生们：

最近一些年，我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开拓研究领域，掀起了一个规模不小的古代地域文化、地域文学研究的热潮。作为国家社科研究中心古代文学学科的领头人，我时时关注着全国各地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动态，我高兴地看到，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心地区之一的甘肃地区在这个研究领域成果比较突出。比如，贵校高人雄教授在这方面堪称有所作为。她不但发表了有关西北地域文化如何影响唐宋文学发展的一系列文章，而且出版了《唐代文学与西北民族文化研究》这本专著。此书内容丰富，涉猎广泛，是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值得关注的好书。此书论证了：唐代文学不单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辉煌，其中亦蕴含了丰富灿烂的古代西北地域民族文化。此书以新颖的视角，围绕唐代文学与西北地域民族文化，探讨唐人诗歌的审美、七言诗的繁荣等与民族文化的内在关联；深入研究了地域作家与反映地域战争和人物风情的唐代边塞诗；并且还论证了：受西北民族乐舞的影响，唐五代词体文学及歌舞戏得到长足发展；对于敦煌民间歌辞、古代西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亦有拓展性的论述。贵校及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的许多研究者在这个领域也有许多优秀成果，由于时间关系，恕我不一一举例了。

除了西北地区的学者、教授之外，全国其他地区的学者们关于西北地

域文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大都见解独到、论证翔实，围绕西部要素对古代文学创作和发展的影响、地域因素对古代文学创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与民族文化交流这三大主题集中论述了地域与文学之间诸多方面的关系。比如暨南大学中文系邓乔彬教授在他的论文《新疆风光和壁画对唐人边塞诗与变文的影响》中指出，盛唐诗歌的雄壮、浑厚气象，颇得之于地理上的西部因素，岑参的边塞诗尤可见之，他的作品与此前符号化、类型化的景象事物不同，而带有难以移易的地域特征和西部风情；唐代文学与西部文化的紧密关系，又见于西域佛教壁画对变文创作的影响，其中关于释迦牟尼成道的变文，应直接受到佛传故事画的启发。上海师范大学朱易安教授的《唐代诗化的音乐和西部乐器》一文认为，如果没有乐器的发展、外来民族音乐的渗透以及唐人对音乐的特殊爱好，就没有唐代的乐诗和声诗的繁盛。西部乐器和音乐因素的加入，改变和大大丰富了中原音乐。唐代诗歌中所反映的音乐演奏状况，正是中原地区人们接受西部音乐和乐器的过程与心理感受，为后世留下了诗化的音乐，从中可以看到西部音乐从民族的、民间的“新声”逐步主流化的过程。

从这些论文和专著的研究角度、方法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者们已不仅仅把地理、地域理解为文学创作、作家活动的客观背景，而且看作渗入到文学内质中的能动因子。这是对地域与文学关系认识上的一个质的飞跃。本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对我们重新审视、继续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演进过程中的许多问题，必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认识出发，我认为，古代文学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大有作为的，甘肃省和整个大西北地区的地域文化与文学研究也是大有作为的。作为一个词学研究者，我在这里仅举一个例子：至今为止，我们对于长短句的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作为一种本来可以抒发人的多方面的感情和具有多种艺术风格的文学样式的研究是非常感情用事和极为不全面的，其中重要的一个缺项就是对敦煌曲子词和陕甘、新疆及中亚地区的音乐舞蹈缺乏基本的研究和理解，以至于急急忙忙地、简单粗糙地得出了词是南方文学和“婉约文学”的片面结论。如果我们能在西北地域文化与文学之关系的研究上（包括音乐、舞蹈、绘画、书法、戏剧及其他文化种类与文学的互动、对文学的影响）能够有所提高和有所突破，那我们的词史、诗史及文化史就应当局部有所改写了。

谢谢大家听完我的讲话。敬请批评指正！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

曹 萌

(沈阳师范大学)

就学科界定的角度来说，一个学科只有能够利用自己的学术范畴、研究方法进行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科学研究才可以称为学科。在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传播学分支学科的文学传播学只有具备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学术规范的完整性、研究方法的科学性、研究成果的系统性才能标志着它的成立。因此在这个分支学科尚未明确建立之前，我们先进行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可以为文学传播学的建设奠定一定的基础。撰写本文的目的在于：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主体、传播方式、传播目的与功能、传播思想、传播类型，以及影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重要因素等进行描述和说明，从中归纳和揭示出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某些规律，以及与传播学发展相关的理论质素。

一 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历史进程

像世界许多民族或国家的文学一样，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最初阶段也是口语传播。人类的口语是因为交流的迫切需要而产生，所以它诞生以后，即成为人类传播最初始的媒介、最重要的媒介，也是最基本的媒介。口语传播文学中首先是一些神话，其中也包括民间故事和英雄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到后来才嬗变为文本或是以其他媒介传播的文学。应指出的是，中国唐朝出现的“僧讲”、“俗讲”，宋代出现的“说话”和元代繁荣的戏剧，也都属于口头传播文学的特例。

口头传播文学之后，是文字传播的文学。由于人类文明的日趋发展，传播交往的深化需要，导致社会信息系统的日趋复杂，也逐渐需求更进步、更先进的媒介，因此，文字这一新媒介适应着这一文化需要而产生。文字对文学的传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与口语为媒介的文学传播相比较，以文字为媒介的文学传播其功能有两个特点，即能使文学信息的传播在空间上做到广阔，又能在时间上持久，而这恰好弥补了口语文学传播的两大缺陷。同时，更使得文学的传播与文字、语言的艺术联系到一起。这一点尽管在文字文学传播初始阶段，或者说在利用文字传播文学信息的初始阶段还不甚明确，那么到了后来，尤其是文学的自觉完成以后，就非常明显了。这就是历代作家，尤其是以杜甫、贾岛、李贺和宋代王安石为代表的那些诗词高手在诗词文字、文句方面刻意雕琢和努力推敲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是印刷传播与文本文学。雕版印刷术是我国的重要发明之一。其具体发明时间尽管目前尚有争论，但它起源于唐代已成定论。印刷术的出现打破了文字传播的垄断。这正如英国思想家卡莱尔在《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所言：“发明了印刷，民主就是不可避免的。”在印刷传播时代，人类传播活动的一项显著进展就是以杂志和报纸为主体的新闻事业的崛起。而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方面说，则是出现了文本文学的繁荣。诗人的诗集、散文家的文集、小说家的小说集、大部头的小说，以及话本、戏剧脚本的印刷本都是代表。到后来一些文学家的文集成为中国古典文献经史子集的一大组成部分。

从传播媒介发展的角度来说，文学传播的下一个阶段是电子传播与广播、电视、网络文学的出现。李彬的《传播学引论》认为电子媒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电子媒介专指公共性媒介，即广播、电视和网络。传播学里所说的电子传播通常用的是狭义，因此在电子媒介传播阶段，文学的传播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广播文学、影视文学和网络文学，但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距离电子传播的产生还有相当漫长的年代，所以，古代文学传播的研究也就暂时将这一阶段放置不论，可是，应该说明的是，此前的中国古代文学传播，已经为文学的电子传播积淀了非常深厚的资源，尤其是在作为文学传播的信息源——题材和内容方面。

二 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媒介

媒介是指信息传递或接受过程中的载体和中介。理解传播媒介需要对它与传播符号、传播形式、传播载体、传播渠道进行一定辨别，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传播媒介的角度看，文学传播与新闻传播的区别在于：传播新闻的媒介是比较固定和专门的，而文学传播的媒介则呈现为多样化。其主要原因在于文学有时本身就是传播的媒介，而新闻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此外，在文学传播中传播媒介与传播方式往往表现为交叉关系，很难明确划清两者的界限。

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我们可以归纳和提出以下几种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媒介。

一是龟甲兽骨。甲骨文是中国原始文学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广义的文学。从甲骨文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它主要是用来记录祭祀、征伐、狩猎、田渔、畜牧、丰稔、出入、疾病、风雨等事宜的文字，有的还涉及经济状况、社会组织与人事等。这些文字的组合也带有文学的性质，因此，龟甲和兽骨可以看作是较早的文学传播媒介。与此相近，有的民族原始文学是写在泥上，或刻在石头上，这样的泥与石头也可视为类同龟甲和兽骨意义的文学传播媒介。

二是青铜器。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还叫青铜书，其媒介是青铜器。这里的“金”指铜与铅的合金，人们在由这些材料铸造的器物上刻铸的字叫“铭”。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其中也有夸张、修饰或想象的成分，因而带有特定的文学性。青铜器于是成为文学传播媒介。青铜铭文的字体，前期接近甲骨文；后来用“籀文”，又称“古文”或“大篆”；最晚的则用“小篆”或“汉隶”体。青铜的铭文，虽然不能算纯粹的文学，但因其本身包含重要的历史和文学价值，故亦被后世视为广义的文学。

三是石。因为刻字于青铜器上太过辛苦，且青铜器的载体面积也有限，所以后来石刻逐渐代替了金文。南宋学者郑樵《通志·金石略》云：“五代而上，惟勤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古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迄今，石刻分为碣和碑两种。此外，我们在许多民族较早的文

学里，也发现过石刻的作品，或者叫石刻书、石刻文。流传到现在的石刻，以秦国的石鼓为最早。其上刻有四言诗：“吾车既工 吾马既同 吾车既好 吾马既宝。”这已经是文学作品了。我国石刻书的正式产生，是东汉末年的“熹平石经”。它由著名学者蔡邕书写。此外，在我国不少名山上都有历代文人学者或各代王朝所留下的石刻，这其中也有许多内容体现出文学的属性，因此这种石头也自然成为文学传播的媒介了。石是一种特殊的物质，当它被用作媒介，就造成一种特有的文献图书形态，是我国古籍版本的一种特殊类型，在这个意义上，石也就成了文学传播媒介的一种。

四是写本文学的媒介。写本是指用笔写在不同书写材料上的书。这是自周代至唐末五代我国古籍和文学文献的主要形态。具体材料包括以下类项：一是竹，即竹写本，即用笔写在竹简上的书，称为“简策”。其形制是一根竹片叫“简”，将许多简编连起来称为“策”；二是木，即木写书，也就是用笔写在木板上的书。一块木板称为“版”，写上字的叫“牍”，一尺见方的牍称为“方”。“方”面积小，一般用于写短文和通信。“尺牍”之名，即源于此。《礼记·中庸》云：“文武之道，布在方、策”；三是帛，即用笔写于帛上的书称为帛书或帛写本书。质地细致的丝织品也叫软缣，用缣写的书，亦称为缣帛之书。《晏子春秋》卷八云：“（齐）景公谓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与穀，其县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以策’”；四是纸。纸起源约在东汉初期，以纸写书比以竹、木、帛写书要晚得多，这与造纸术的发明有密切关系。唐代发明雕版印刷术后，纸写本仍很盛行。五代以后印刷术普及，纸写书才进入末期。但在明朝，像《金瓶梅》这样的小说仍有手抄本流行；五是雕版。雕印文学在唐、宋、明诸朝都颇为繁荣，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的印刷都很多。如北宋书坊中著名的就有永顺书堂、岳家书坊、汪氏书肆。永顺书堂曾刻印一些唱本和传奇，岳家书坊刻有《西厢记》，汪氏书肆曾刻印《文选注》、《史记》、《苏诗》、《韩诗外传》等；六是墙壁。作为文学传播媒介的墙壁，主要是旅馆、酒店、驿站的墙壁。题壁是中国文化和文学中特有现象，也是中国文人传统嗜好之一。而与墙壁相近的文学传播媒介还有诗板或诗牌。唐宋时期人们出于爱护壁的需要或方便题诗者，不少寺院、驿站专门设有诗板（诗牌）供过往行人题诗。

当然，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的媒介并不止于上述，比如“说话”艺术